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现代化与中国20世纪文学

Modernizatio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 黄曼君 著



013059041

I206.6

157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现代化与中国20世纪文学

Xiandaihua yu Zhongguo 20 Shiji Wenxue

○ 黄曼君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北航

C1667508

I206.6
1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与中国20世纪文学 / 黄曼君著.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04-037750-7

I. ①现…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20世纪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9264号

策划编辑 陈 瑛
责任校对 刘娟娟

责任编辑 陈 瑛
责任印制 韩 刚

封面设计 张 志

版式设计 王 莹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20千字
插 页 2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7750-00



以厚積薄發四字篆印一方

贈高等教育出版社

厚積薄發

李鼎清



二〇〇七年
初秋

學無止境
生也有涯

任繼愈



总 序

哲学社会科学是探索人类精神和精神世界奥秘、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其研究能力和科研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真正强大的国家。

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and 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党中央在新时期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长期以来，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科学，甘于寂寞，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着难得

的发展机遇。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振奋精神，锐意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思想库作用，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光荣而神圣的社会事业，是一种繁重而复杂的创造性劳动。精品源于艰辛，质量在于创新。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离不开严谨的科学态度，离不开辛勤的劳动，离不开创新。树立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名逐利的良好学风，是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营造有利于学者潜心学问、勇于创新的学术氛围，必须树立良好的学风。为此，自2006年始，教育部实施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计划，旨在鼓励高校教师潜心学术，厚积薄发，勇于理论创新，推出精品力作。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欣然为后期资助项目题字“厚积薄发”，并篆刻同名印章一枚，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亦为此题字“生也有涯，学无止境”，此举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深切勉励和由衷期望。

展望未来，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宏伟目标和崇高使命，呼唤着每一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和智慧。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以优异成绩开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谨以此书纪念

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序 一

王富仁

20世纪80年代,国家的政治方针是“改革、开放”,社会上的潮流是告别“文化大革命”,社会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现代性”,与之相呼应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学科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研究,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那时颇“火”了一把;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政治方针是经济改革,社会上的潮流是下海经商,社会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后现代”,与之相呼应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学科是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现代性”开始受到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失去了龙头老大的地位;21世纪第一个十年,国家的政治方针在新建立起的“崛起的大国”观念的基础上得到调整,经济上的潮流是炒股、买房子,文化上的潮流是“国粹热”、“国学热”、“儒学热”,社会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是“中国模式”、“民族性”,与之相呼应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研究,“现代性”受到相当普遍的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被严重边缘化了。

黄曼君先生的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并且都在那时享受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颇受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人关注的滋味,所以对“现代性”这个概念也情有独钟。难能可贵的是,黄曼君先生始终没有放弃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现代性”这个概念,并且在离开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之前还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部系统研究“现代性”的学术著作。

实际上,在整个人类文化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化概念都不可能永久地占据文化的核心地位,否则,人类文化和这个民族的文化就停滞了,就会愈来愈被大量不相干的观念所异化,导致人类文化和这个民族的文化陷入混乱无序。但是,在

整个人类文化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文化概念都不会轻易地退出文化的舞台，都不会在人类文化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总是在不断地被重新感受、重新认识、重新诠释中获得新生，并发挥其持久的影响力。否则，人类文化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像走马灯一样，积淀不下任何一点有益的东西。

“现代性”这个文化概念也是这样。

黄曼君先生是我们的学术前辈，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参与了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且以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沙汀研究专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成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我和黄曼君先生相识是很早的，20世纪80年代初他到外地参加学术讨论会，路经西安，那时我还在西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我和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的蒙万夫先生一起去火车站接他和师母，第二天又将他和师母送去火车站，从此就认识了他。1982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去攻读博士研究生，与我同舟共济的博士生同学金宏达老弟就是黄曼君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黄曼君先生每到北京，必去看金宏达老弟，我也就能在我和金宏达老弟共住的“长工屋”中见到他。久而久之，就熟悉了，就有了一点忘年交的味道。

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也开始“忝列”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几乎每次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会上，都能见到黄曼君先生。我们这一代人，实际只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剩男剩女”，在初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时候，是颇受一些前辈的猜疑的，有时甚至会受到公开的批判。现在看来，这都是一些正常的现象。思想上、学术上乃至政治上的分歧总是难免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但那时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又是初入文坛的“老童生”，还难免“画眉深浅入时无”地担心，所以对别人的批评颇为在意。黄曼君先生却从来没有流露出过对我们的歧视和冷落。比起我们这些新中举的范进来，年龄更长的他反而表现得更加单纯和直率，不拘小节，没有架子。当时与他同校的一位教授正在集中批判我，所以我对他这种没有芥蒂的态度甚是感激。后来我给他起了一个绰号，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也不以为忤。据我所知，他对他的研究生都是很随意的，他的研究生也都亲近他、爱护他，甚至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关心他、体贴他。这在中国当代的师生关系中，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他爱跳舞、爱作诗，听说在华南地区还参加过一种集体舞的大赛，拿过奖。20世纪90年代，我还曾应邀参加过一次他的博士研究生的答辩，一见面，他就给我背诵他写的诗。也是在那一次，在他的精心策划下，我跳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交际舞。总之，黄曼君先生在我的

印象里，是一个非常天真可爱的模样。虽然知道他是一个成绩卓著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但在心里，并不怕他。

黄曼君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也正病重住院，甚至没有听到他去世的消息，不但没有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甚至连一个唁电也没有发，对这样一个一直关心、爱护我的学术前辈，实在感到抱歉。师母嘱我为先生的这部遗著写序，正好给了我一个补救的机会。这篇序言，就算是我对黄曼君先生的由衷的悼念吧！

愿黄曼君先生的灵魂在九泉之下安息！

2013年元月2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序 二

王 进

黄曼君先生的遗著即将出版，遵师母之命为本书作序，心中百感交集。望着这本厚重的大书，先师的音容笑貌宛在目前，那些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论断，还有那些纯真的风采、赤子的情怀，都一一浮现在眼前。老师走得太早了，以他的心理年龄计，再过 20 年他都会保有一颗年轻的心。我于 1996 年秋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黄老师门下问学三年，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已经亲聆教诲，另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则是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思考成果。让我惊讶的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的思想与智慧的光芒竟是如此地大放异彩。

读罢全书，有几个方面的感受使人印象深刻。

首先，这是以一人之力对于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全面论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主要论域都有深入的观察，这个工作此前似乎少有人做总体性的探讨。尽管以前有些合编文集试图做这样的宏观审视，但由于视角、水准以及才力的参差不齐而影响一般。黄曼君先生着力最多的一个论域是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他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长久的关注与热情。特别有新意的是他把鲁迅、郭沫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都放在现代性这个大视野下来加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考验就是如何对“革命话语”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说和价值判断，这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大多采取了简单批判的态度，似乎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多多，根子就在于“革命”的意识形态与主流的理论话语对文学艺术的介入和伤害。如果联系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对文学的深刻影响，这种清算政治革命以维护文学审美

纯粹性的主张好像颇有市场，“告别革命”甚至已经成了时尚的文化标签。黄曼君先生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非但没有回避，而且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对文学主流话语进行现代诠释。简言之，他把“革命性”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来加以关注和讨论，我以为，这是一个极为聪明且富于智慧的理论建构，它是对于近些年来有关“革命”问题讨论的一次超越。黄先生指出，“毛泽东的《讲话》及其文艺思想体系所揭示的革命性、政治性、民族性和大众性是中国社会和文艺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和‘告别革命’的思潮认为是人民革命、政治救亡和民族战争压倒了‘五四’以来呼唤科学与民主、张扬理性精神、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思潮，阻碍了近百年来为建立一个与世界潮流一致的民主、开放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延误了形成新文学现代品格而进行的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我以为，这种观点有其片面性。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革命救亡与启蒙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矛盾”。这是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清晰的判断。近些年来，许多人在抱怨政治与革命，好像我们没有产生伟大作家的原因是受了政治的拖累。然而从历史上看，伟大的文学总是在伟大的革命中走向成熟。奇怪的是，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中人们似乎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以远离政治和告别革命来保持自己的艺术贞操，鼓吹所谓的“纯文学”。我以为这种理论值得商榷。即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而论，在整个20世纪中，革命都是一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所谓“红色三十年代”和“红色六十年代”，指的就是这场世界性的政治狂欢，或者说20世纪文化的主题就是革命。在一场以颠覆为使命的文化转换中，政治话语是最基本的，甚至是唯一的言说方式，作家参不参与政治是无法选择的。政治言说方式于60年代在全世界都达到了高潮，马尔库塞和萨特都曾以这种方式参与其中并成为了一代大师。在中国的20世纪文学中，鲁迅、郭沫若和闻一多都曾以强烈的政治激情与当代革命的主流话语沟通，他们也都成为了一代文化巨人。这里的关键在于他们的政治激情是出于文化的良知而非政治的盲从，是对黑暗现实的文化抗议。因此，他们最终完成的是一个诗性的生命和诗性的人格，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政治把你造就成了庸人，而是你是否以庸人的心态参与了政治。中国当代有些作家在巧妙地避开了政治的同时，也把自己造就成了庸人。因此，把自己不伟大的责任推给政治只具有有限的合理性，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则是因为许多当代中国文人已经高度地庸人化了。而一个毫无政治敏感与革命冲动的作家，几乎命中注定了与“伟大”无缘。只要看一下最近若干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取向，就可以看出中国有些文人的聪明与世界大势是何其南辕北辙，其生命的质量与内涵是何其苍白无力。诚然，我们也有人写了极“左”政治下的苦命与苟活，但那只是让人可怜的煽情

而非悲天悯人的境界，缺乏一种终极关怀的普照的光，还缺乏一次伟大的革命性冲击。因此，我以为黄曼君先生理直气壮地张扬革命的主流话语，是真正体现了思想穿透力的史家眼光。

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思考也是黄曼君先生卓有建树的领域。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黄著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论思路 and 理论自觉，他是以一种宏观吞吐的学术气度，有意识地建构并贯彻自己独特的诗学范畴，在一个统一的逻辑链条上展开对文学现象的探究与论述，全书思路一以贯之，各种文学史的事实也反过来支撑着他的理论建构，这个一以贯之的诗学范畴就是黄先生反复申论的“诗、思、史”的统一。黄著是围绕现代文学经典的思考而展开的。何谓经典？中国现代文学有无经典？这是多年来困惑当代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黄先生的立论是对近年来有关现代文学经典问题的争议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他从精神意蕴、艺术审美和民族特色三个角度来展开分析，认为文学经典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而在西方思想史上历来主要是思与科学、宗教的对话，少有思与诗、思与史的对话，只是从20世纪初年的“诗性转向”开始，才算真正完成了这种融合，而在中国社会追求现代性的进程中，这种思、诗、史相融合的新文学经典便在这种“诗性转向”中诞生。黄曼君先生在他的独树一帜的文学经典论中有如下一些运思方式值得重视：1. 现代文学经典是对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回应，它是现实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审美表达，但是，现代作家对现代性的理解一开始就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2. 对现代文学的阐释历来存在着诗与史的二元对立，而通常的阐释维度是强调了史而忽略了诗，这也是对经典的焦虑所由产生的根本原因，其实诗是经典的根本元素，没有诗就无所谓经典，而回到诗则是回到人类生命最深的本源；3. 现代文学经典体现了对世界性语义空间的回应，它对当代世界哲学美学文化思潮的吸收是前所未有的，否则就与“现代”二字名实不符。同时，它也因此获得了深刻的思想含量，而伟大的文学经典通常都有伟大的思想，肤浅的文学永远与经典无缘。本书在对经典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及延传的历史进程。经典既是实在本体又是关系本体，是那些能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意识形态、精神价值以及知识、审美诸系统的变化与整合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革命化与审美化、民族化与现代化、大众化与精英化三对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延传的不同路向；而新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与反思，则展现了现代文学经典在延传中变异和重构的发展趋势。全书以突出精神文化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

构为线索，从精神意蕴、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三个方面对文学经典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中国 20 世纪新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与阐释中的新文学经典世界，并对“思”的诗化与实用理性化的不同倾向进行辨析，展示出思、诗、史关系的不同组合带来的经典之间、经典阐释之间以及新文学史之间的类型区分与矛盾冲突局面。

其次，全书表现出了在史与论两个领域的洞见与卓识，这在当代学术界几乎是一个特例。当代中国文学界一直以来就有史与论的隔膜，搞纯理论的不熟悉文学史而失之于空疏玄谈，而搞文学史的则不熟悉理论而失之于呆板拘泥，黄先生则是少有的能在史与论之间相互打通，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相互衔接的学者，可以说深得王瑶先生之遗风。

黄先生首先是一位文学史家，他对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都有精到的研究。特别是对鲁迅、郭沫若和沙汀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与高度。但是黄先生并不满足于对具体作家的个案分析，而是由此生发开去，对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进行了宏观审视，这是极为难得的学术品格。我在多年以前曾经撰文谈到过一种学术现象：有人做过统计，在现代文学领域，全国从事高校教学和专门研究的人员加起来达三千多人，研究现代文学三十年历史和研究古代文学三千年历史的人数大体相当。这么多人挤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内，写论文、读学位、当教授，要想“出成果”、“出创见”，如果不是挖空心思地没话找话肯定是不行的。于是许多“大师级”作家被研究出来了，许多“创造性”成果被研究出来了，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研究一个作家出了名就能当上教授，是现代文学领域的独特现象，因而对一个作家成就的“发现权”、“专利权”就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对象的地位和研究者的地位也具有了某种等值性。“重写文学史”的命题本来对古今中外文学均有普适性，但是现在人们已经下意识地把它同现代文学联系起来，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反应也最为强烈，这原因即在于“重写”的结果意味着对某些人的个人成果乃至一生心血的否定，对其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动摇。例如对茅盾文学创作的反思就使许多“茅盾研究”的专家们大为光火，同样，由于茅盾创作在现代文学领域的典范性，也使许多具有相同研究思路的学者极为尴尬。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垄断化倾向和前科学色彩。所谓垄断化倾向，是指某些成果的个人专利性质和一厢情愿特征，这些成果本来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由于学术上的师徒授受和近亲繁殖而形成了小圈子的一家之言。所谓前科学色彩，是指某些成果尚未摆脱情感因素的羁绊，突出表现为对研究对象的过分钟情，这可能是由于现代文

学研究多为对“活人”的研究所致，正是由此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非批判性，包括对某些大师级人物弱点的容忍。在这样一种“敝帚自珍”的研究态度面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否已经真正进入了“史”的状态值得怀疑。“史”就是超越、识见和视野，就是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之后的审美静观，而由于现代文学与当代生活的政治功利关系过于密切，我认为我们还远未达到“旁观者清”的境界。正是在这样一个研究态势中，黄曼君先生的研究思路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他的整体研究框架呈现出了非常清晰的学术转向：从个案分析转向了宏观概括，从三十年转向了一百年，从史的深入转向了论的拓展，从政治诗学转向了文化诗学，从现实视野转向了古典探究。应该说，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总体走向，但是在一个学者的身上能实现如此全面而漂亮的学术转型则不多见。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古典，王瑶先生最早从新文学的研究回到中古文学史论的领域，杨义先生从现代文学研究回到了先秦诸子，而赵园先生则是从现代小说回到了明清士大夫研究。这些学术转型的意义今天进行评价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是它却是意味深长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的研究较之文学批评要有更高的历史哲学意味，需要同研究对象保持更开阔的时空距离和情感距离，这是获得文学研究科学性的必要前提。诚如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关于历史研究的一个看法：他说，最初，他感到困惑的是，抗战后国民党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了台，他想弄明白这件事，但后来发现，这至少要“退后”二百年才能弄清，所以后来才搞明史。他强调“向后退”，视角才能扩大，看到的画面才比较宏阔，才能找到现实的准确坐标点，才能看清未来的方向。他说，人的眼界都受到生命尺度的限制，这个尺度只有一百年，太小，逼得太近，反而看不清。而贯穿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宗教的共同主题就是“超越生命”，克服局限性^①。这是说的社会史和政治史，其实文学史和艺术史亦可作如是观。某种文学现象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盛衰，虽然在最终的意义上要由经济基础来解释，但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有着复杂的文化历史原因。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宏阔的历史眼光和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同研究对象之间保持明确的心理距离和超然的情感态度，从而达到对于对象的审美掌握。然而这在目前却又是难以办到的。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真正能达到超然境界的作家和批评家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很少有人不受到功利主义和庸人气息的渗透，创作与批评概莫能外。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渴望超越，渴望在人类文

^① 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63页。

学历史的链条上留下一段闪光的痕迹；另一方面我们又无法否定，无法在一种世纪性的反思面前走向深刻。黄曼君和王瑶、杨义、赵园诸位先生所代表的这种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我以为与黄仁宇先生的历史领悟达到了相同的历史哲学高度，他们都试图超越“现代文学三十年”和“20世纪文学一百年”这个狭窄的时空，在一个更开阔的文化背景上理解当下。所不同的是，黄曼君先生的研究不是单纯地回到古典，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调动古代文学资源来阐释当下，把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贯通起来，这样的学术气度和学术境界更加令人感佩。

第三，创新的冲动与才情的挥洒，体现了一种极富激情与活力的学术品位。本书的大部分命题是黄先生近年来的思考成果，那种只研究一个人就能当教授的学术格局在他身上已不复存在。他不断地向新领域发起冲击，在知识结构方面让自己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基础，把现当代文学研究推进到了更具学理性的学术高度，力求在思想与智慧、学术与才情的张力关系中彰显研究价值与学术风范。

体现思想与学术之间的张力，是黄曼君先生对现代文学这个学科本身的学问方式的一种追求。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自从这门学科诞生起就面临着某种尴尬：由于它的政治性太强，在一些古典文学专家的眼里它算不算一门学问是有疑问的。有的人甚至认为这里没有什么学问要做，也是不必具备良好的学术基础就可以做的一门学科，有些学生是在自问古典底气不足的情况下才去考现当代文学研究生。面对这样一种学术困局，黄曼君先生在三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一是在自己的文化视野和知识结构方面拓展，让自己具备最宏阔的视野和坚实的知识基础；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汲取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资源，让自己的学术工作始终保持在当代学科前沿的水准上；三是从学问到思想，始终把思想的追求放在首位，让文学研究成为激活思想、启迪智慧的一个契机而非一个饭碗。认识黄曼君的人都知道，他几乎是一个购书狂，每每听说一本新书，他都一定要相约几个学生去逛一趟书城；买到一本心仪的好书，他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得意和开心。而他与我们这些博士们谈论的话题，有时竟让我们这些自以为精通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年轻人瞠目结舌。他的不拘成见、好学进取的热情也让我记忆犹新。我的博士论文是在国内最早用后现代的方法阐释鲁迅的研究课题，一开始他并不完全认可，但他还是包容了我的有点野性的思路，并且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鼓励我的思考。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了自己对这个课题的了解与钻研。到了论文送校外专家评审后，他有一天打电话高兴地告诉我：评价相当高啊！由此我感觉到，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黄老师也恶补了很多东西，他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黄门问学三年，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黄先生对新知